

中国的旗袍文化

◎梁凤英\文、摄



旗袍被誉为中华女性服饰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虽然现在已很难看见身着旗袍、左手执油纸伞、右手执香扇的雅致美女款款而步,但那唯美的景象至今很多人依旧向往。数千年来,我国对女性的要求是非常严肃的,旗袍服饰也是封建主义对妇女要求的产物,但旗袍作为中国女性服饰美的元素已经被世界认可,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凤冠霞帔,母仪天下,如果说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把妇女的最高期望值定到这里,那么最能说明一切奥妙的关键字眼就是“表现”。把美好的体貌表现出来的唯一媒介是好的服装。

“霓裳羽衣”也好,“凤冠霞帔”也罢,除了对那种繁华尊贵的追求之外,无论如何也剪不掉那段渴望美丽、渴望风采浪漫。旗袍的出现或许就因为如此吧。

人类文明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女性的服装也随着历史不断改变。比起科技带给世界的巨大变化,人体却顽强地保持了原状,这虽然不能算是奇迹,却为服装发展史、提供了可能。服装不能脱离人体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样。女性的头、颈、肩、臂、胸、腰、臀、腿以及手足,构成众多曲线巧妙结合的完美整体。旗袍的审美,似乎可以从这里谈起。

东方女性的神韵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提倡民族服装,日本的和服,朝鲜的韩装以及越南、泰国、印度、中东、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中国的旗袍以巧手精制细作,以形象逼真、造型完美的花扣和雍容华贵、合体大方的旗袍交相辉映……那样的女子,内敛、文秀、典雅,处处透着良好的家庭教养和几代书香的熏陶,或动或静,一如清雅的国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

海,在百乐门的跳舞场上,霞飞路的先施公司里,黄浦江畔的路灯下,常常有这样的女子闪过:烫发,描眉,勾眼,点唇,身着及膝或高衩的旗袍,织锦缎、洒花绸、水波绉、乔其纱,朱红、翠绿、宝蓝、金黄……衣香鬓影,流光溢彩,营造出十里洋场的香艳繁华。当然,旗袍也可以是朴素的。平常人家女子身上,大多是白夏布或丹士林布的自制旗袍,少了繁复的手工和精致的装饰,透出的是平和、温厚和安心。人就格外显得庄重、朴实、一斯文雅!在青瓦白墙的小院里,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临河而筑的河桥旁,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忙碌身影。旗袍毕竟只是一种服装,不凡女子可以将它演绎得卓尔不群,“五四”时期的女学生身上的蓝布旗袍,配上一端垂于胸前,一端搭在肩后的围巾,洋溢的是年轻的书卷气和意气风发的热情;张爱玲可以用一件绿底红花的俗艳旗袍映衬才华横溢的清高。

旗袍的起源

旗袍始于清朝的满族旗人着装,已有 300 多年发展历史,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是国际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女性代表服装。主要结构特征为立领、右大襟、紧腰身、下摆开衩等。旗袍在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那雍容大方的款式,曾经使几代人为之倾倒,被世界公认为是能代表我国民族特色的服装。

在 20 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汉族女性改进,由中华民国政府于 1929 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旗袍是民国时期的妇女时装,他的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明朝中期的明立领中衣褙子,后移植到满族妇女的无领长袍上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民国以后,上海、北平等地的汉族女性在其基础上予以改良。1949 年之后,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认为封资修象征大量毁坏。

旗袍走向经典的过程,可说

在 30 年代已基本完成,40 年代是其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20 年代以后到 40 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 30 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旗袍款式的变化主要是袖式、襟形的变化。袖形的款式主要有:宽袖形、窄袖形、长袖、中袖、短袖或无袖。旗袍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京派与海派

旗袍的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设计师与旗袍经过 20 世纪上半叶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经典相对稳定,而时装千变万化。但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旗袍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旗袍是近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的传统时装,而并非正式的传统民族服装。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加之可欣赏度比较高,因而富有一定收藏价值。

中国旗袍有与西方服饰审美一致的特征,并非偶然产生。在当时,上海这个中西文化杂处的大都市是最具条件的诞生地。现在我们或许已经难以寻找中国旗袍在上海诞生的确凿证据,但我们还是可以断言,海派袍是中国旗袍的典型。如果我们再胆大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现代旗袍,或缺义的旗袍,就是海派旗



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生： 借助汉语造出日本文字

唐朝的时候，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盛况空前。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遣唐使”，还有6次迎送唐朝的使者。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使团回日本时，留学生（僧）们则仍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

7世纪以前，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靠中国移民的传播。至推古天皇在位（593~629）、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日本开始直接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主动学习中国文化，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隋朝也是中国开始大批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时期。

随使节一同来华

日本最重要的“遣隋使”是圣德太子于隋大业三年（607年）派出的。他派小野妹子携带日本天皇的国书到达隋朝东都洛阳，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当时日本在外交上一项重大的措施。从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大业十年（614年），日本派“遣隋使”达5次之多。公元608年，开创了随团派

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先例。这不仅仅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圣德太子汉学功底深厚，很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措施，积极地从中国导入各种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完善的国家体制，因而所派遣的遣隋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

唐朝的时候，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盛况空前。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遣唐使”，还有6次迎送唐朝的使者。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使团回日本时，留学生（僧）们则仍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

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日本留学生们在中国学习几年甚至几十年，再回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从奈良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圣德太子像

晁衡：留唐任职，一住54年

阿倍仲麻吕（698~770）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晁衡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还不满20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先后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左散骑常侍是从三品，可见他很受唐朝的重用。

晁衡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相赠。晁衡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

袍。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旗袍两字所引发的联想或意象，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旗袍。近代旗袍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腰部更为

合体并配上了西式的装袖、旗袍的衣长、袖长大大缩短、腰身也越为合体。

现代旗袍的外观特征一般要求全部或部分具有以下特征：右

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单片衣料，收腰，无袖或短袖等。开衩只是旗袍的很多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要的。